

不学诗， 何以言

夏传才 著

皓首穷究风雅颂，
青云志在铸诗魂。



不学诗， 何以言

夏传才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5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学诗, 何以言 / 夏传才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459-0985-2

I. ①不… II. ①夏…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0824 号

BU XUE SHI, HE YI YAN

不学诗, 何以言

夏传才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潮县镇后地村北街 300 米工业园内 邮政编码: 101109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插页: 1

印张: 8

字数: 172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9-0985-2

定价: 38.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我的治学之路

在我们的时代，人生道路并不由个人选择。有时，我们是颗“螺丝钉”，不自主地被摆放在一个位置上；有时，风暴袭来，又把我们掷向痛苦的深渊，而这风暴歇斯底里的一阵又一阵，我们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出生在城市贫民家庭。母亲终日为人洗衣缝穷，一个一个铜板积攒起来，送我进最好的学校读书。她因肺病缺药又过度劳累，早早逝世。我在中学，必须每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进入前三名，方能获得奖学金充作学杂费，所以我的功课特别好。作文比赛在全县夺冠，划船比赛是全省亚军，演讲、打球、珠算……凡有比赛我都参加，争取获奖，哪怕奖品是一套秋衣或是一件文具，我都十分需要。我曾因为买不起规定的白球鞋黑袜子而不能进入校门，现代青年很难想象旧社会穷人子弟读书是多么艰难。然而艰难锻炼了我，屈辱激励着我，我常常背诵《孟子》的格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读中学时国难当头，受到救亡大潮的洗礼。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穿上军装奔上战场，参加台儿庄会战。那年，我的身材没有步枪高，只能当战地服务团团员，在话剧队饰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里的少年，在歌咏队合唱《大刀进行曲》，在战壕为士兵代笔写家信。那是国共合作时期，战地服务团的领导和骨干，都是共产党人。文艺工作的推动，共产党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革命文学和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并开始学写诗。战地服务团被国民党解散以后，我流亡到大后方继续读书。

如果不是抗日战争，我不太可能有机会读高中、读大学。在战争中，国家办了专门收容流亡学生的学校，一切全由国家供给。在学校，我组织文艺活动，参与民主运动，也练习写新诗。我把徐州会战突围的经历和体验写成一篇350行的《麦丛里的人群》，想不到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生路》（1940.3.15）以全版篇幅发表，当年我16周岁。我还向茅盾先生主编的《文艺阵地》投稿，与先生通信，《文艺阵地》停刊后，投去的诗被转到重庆《时事新报》等报刊发表。不久，在一次学运失败后，我和几位同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我的高中学业就这样结束了。出狱后，我只有转学，好在我的功课好，便直接考上大学。但是，虽然换了个地方，我仍是国民党当局监视的学生，没读多久，便意识到一只黑手将随时撕裂我，我秘密逃亡了。

1941年春，我在白色恐怖下步行翻越积雪及膝的陇山，历经半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腥风血雨的古都西安，寻找我初恋的女友，准备会合同一去延安或敌后。我得悉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

厅长的郭沫若先生从政治部开出一张通行证，艾青、罗烽、张汀持此通行证去绥德转往延安，在宝鸡停留时，把“三”字改为“五”，就可多去两个人。不料，我到西安的前夕，女友被捕，心力交瘁的我大病一场。病愈到宝鸡，已经是严辰、逯斐二人随他们去延安了。人生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事故，常常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我只有暂时住到宝鸡县郊的集硤石工合新村，为办刊物的王亚平做助手，也在亚平夫人刘克顿主持的工合女子职业学校代课。当时我用的是化名，过着近似蛰居的生活。

这里是四千年前周人祖先发迹的岐山之阳，渭水滋润两岸沃野。我住的村子，远离尘寰，听不见抗战的炮声，也不受警宪骚扰，附近村落全是窑洞，民风古朴，刀耕火种，我深感历史的悠久，民族的苦难。肥美的周原，芳草初绿，春夜月明，馨香醉人，不由而生思古之幽情。想起在课堂上学的《诗经》，追寻这片沃土上先民兴国的事迹，于是翻阅旧籍，打发光阴，认真地读起《诗经》来。我觉得郭老《卷耳集》的今译多不合原意，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便动手试译。我认为要一句句翻译，就马虎不得、偷懒不得，这是最好的学习。可是，我在宝鸡乡下只住了几个月，得知国民党县党部调查室（中统）开始调查我，我就匆匆离开了。学译《诗经》的事，自然不了了之。

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我们的民族正与敌人作殊死的搏斗，一个青年不能到战场去，而化名蛰居山村，啃起古老的《诗经》，这岂是我的本心？这不过是时代进行曲中一个变奏的音符。而我与《诗经》结缘，从那时算起，已经超过六十年了。

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到达上海“孤岛”，安排的是通过“关

系”去敌后。日本法西斯一夜之间占领了租界，“孤岛”不复存在，我要寻找的“关系”全部消失了。我只有暂时留在沦陷区，半工半读完成我的大学学业。我继续学写诗，写成的不多，偶尔发表。我喜欢艾青、叶遂宁和涅克拉索夫，受他们的影响，初到上海时写了一篇《孤岛夜曲》，600行，是有感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创作的，1943年发表在关露编的《女友》杂志上，稿费可作我三个月的生活费。诗写得不好，有的地方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没想到被日本的《华文大阪每日》转载了，大概是因为诗中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吧？前年在天津逛书店，偶然发现北大钱理群教授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其中竟然编选了我另一首600行长诗《在北方》，因为是五十多年前的笔名，所以编者无从与我联系。这篇作品原作于1942年，抒写我对华北敌后根据地梦魂缭绕的向往，发表在1944年的上海《文潮》杂志。因为我被日本法西斯逮捕入狱，样刊未见到，也不知道曾经发表，连曾经写过这篇作品，都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记得山丁、袁犀编《华北创作连丛》，也发表过我的组诗，因为我用预支的稿费买车票，所以记得有这样的事，但样刊我也同样未见到。出狱不久，我去了晋察冀解放区。我想换一个天地，就让往事如烟吧。

在根据地，我写的诗不符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我不了解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不熟悉工农兵的语言，要把思想“改造”得“脱胎换骨”，将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曾尝试配合工作需要写剧本，在单位内部排演就“砸”了，因为剧中人物“穿着工农服装，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只有不写。胜利后进进了城，又见到过去搞文学的老朋友，都劝

我继续写，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试着发表了一首，立即就遭来批评，说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穿军装的小资产阶级，歪曲了人民战士的形象，云云。这首诗就是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被选编进《当代抒情诗拔萃》的《彩花头巾》，是不是该批，已有公论了。当时我内心挺腻歪。我想，我有本职工作，不靠写诗安身立命，既然落个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何必再写诗来自讨没趣呢？于是下决心永远不再写新诗。做这样的决定，也因为我对当代的诗歌发展现状有不同的看法：一是当时的颂歌太多，诗是心声，为新中国、新制度以及爱戴的领袖唱颂歌自然是可以的，但太多了，有的虚情假意就不敢恭维；二是当时提倡学习民歌，实际是提倡诗人的创作仿民歌，好多是顺口溜、大白话，这不是进步，而是诗歌艺术的倒退，我不肯去写“小放牛”。

由民歌运动，我又想起《诗经》。它的《风》诗被称为“民歌”，为什么历经两三千年，它还有迷人的艺术魅力呢？《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源头，其影响源远流长，它哺育了屈原赋和汉魏六朝古诗，唐诗的兴盛繁荣和辉煌成就，归功于初唐高举的“风雅比兴”旗帜。在中国诗史上，凡继承《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就会出现诗运昌盛的局面，出大诗人，出传世佳作；反之，背离这个传统，就冷冷清清，一片空白。郭沫若先生在《文艺报》上发表《谈谈诗经》，提出《诗经》的艺术过于古老，已经没有什么可学习的了。我不同意郭老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当代新诗还必须继承风雅比兴传统，研究和学习它的立意、谋篇、面向现实、干预时政的创作思想和赋比兴的创作方法。

20世纪50年代起我到大学教书，收集了一批资料，读了一点

书，准备研读《诗经》，完成多年前译《诗》的夙愿。可是，因工作需要，分派我开“苏联文学”这门课。我一再说明我不会俄文，讲不好。他们说：这门课是教育部规定必开的课，国民党时期，老师们看不到俄苏作品；我从老区来，至少看过一些，所以让我来讲。为了集中精力备新课，编讲义，研译《诗经》的计划，只译了几篇，就不得不搁置一边了。那几年，我出自本心想研读《诗经》，却不能如愿。我想干的事，不能干；不想干的事，却不得不干。要我主讲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而且编著讲义印书，我怎么能干得好呢？讲义出版不久，便受到《文艺报》的批评。

我毕生所追求的，是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祖国富强，民生康乐；建设一个博爱、平等、自由的新世界，是我的理想。为了实现理想，我曾走上战场，也曾在监狱里挺过酷刑，我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我争取民主，国民党把我投进监狱；我争取民族解放，日本法西斯把我投进监狱；我要求博爱、平等、自由，又被批判为宣扬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口号。对于粮食统购统销造成农村饥民流亡、阶级斗争扩大化、组织工作唯成分论、唯历史论的形而上学方法，我比较谨慎地发表了我的意见，当50年代中期一次风暴袭来，“在劫难逃”，我又被我曾经信任和依靠的党投进监狱。我被打入社会最底层，写诗、治《诗》，什么都谈不上了。我只能在孤身独处时悄悄唱着青年时代常唱的《热血歌》：“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

从监狱到劳改营，再从劳改营回到监狱，监禁和流放，一共二十三年。春天大风沙，对面不见人；夏季烈日灼人，白天农田挥汗如雨，夜间蚊蚋咬人难以睡眠；秋天是最忙的季节，披星戴月，

乃至燃火把夜战；入冬，又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年复一年，年年都有无数个漫长、严寒的冬夜。如何打发这与世隔绝的凄清、寂寞的时光？如何能够投入一处持续的思维活动而忘却现实的生死荣辱？监管当局对我的要求，是通过笨重的体力劳役，改造为对世事麻木的农工或牧工，他们让我忘却过去。但二十三年，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人类文明的成果——中华文化和现代科学民主思想。

我爱读书。书是我那个时期的全部精神寄托。我能够阅读的书，只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我通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主要著作读了多遍，还做了摘要笔记。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和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阐述，是非常正确和深刻的。至于他论述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将首先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列宁论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夜，这些预言经 20 世纪的社会发展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我认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代表了 19 世纪人类理论思维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很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其中也有阐述不充分的地方，例如，过于强调事物的矛盾斗争，而较少注意“和而不同”。事实上，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各种矛盾因素和平共处，才有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如果总是要求“同而不和”，斗争永无宁日，何谈建设与发展？从中国历史来看，在经过战争破坏和建立新政权之后，实行“无为而治”，给社会和平稳定的环境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与文化，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我觉得不应该与人类最好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对立起来，我不同意斯大林和苏共借“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国家机器制造赤

色恐怖。二十三年的监禁和流放，我重新思考了世界、国家和我个人命运的许多问题，不再有青春的狂热，也未为个人现实处境怨天尤人，尤其在一次自杀未遂之后，我的认识得到较大的提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我以后治学的指导理论。我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运用它的基本原理来观察问题，同时我也注意学习 20 世纪人类理论思维新成果，理论方法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二十三年中我有三大收获：一是锻炼了身体，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增强了体质；二是磨炼了意志，不怕苦，不怕死，逆来顺受而志向不改；三是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终身受益。

我也读历史，能看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它太简，而且太靠向阶级斗争论而缺少深度，但总算开卷有益；也看一度风行的“新史学”，像杨荣国写的中国哲学史，他说他的瞎话，我有我的看法。我唯独不读农业和畜牧常识。我不是轻视农牧业，而是因为监管当局一再要我“做个有文化的农牧工”，我偏不做。这也是在那个处境中，我出自内心所表示的一种无言的抗议吧。

感谢我的妻子，她自愿离开大都市，抛弃医院的工作，像涅克拉索夫所歌颂的旧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样，远涉荒寒的西伯利亚，来陪伴政治犯的丈夫共度那艰辛、屈辱的岁月。这样，我就离开集体宿舍，有了自己的“家”。白天劳作后的每个夜晚，那十平方米的土炕茅屋，便是属于我的“自由天地”。她带来我过去的一点存书和手稿，于是我又读我自己的书，又翻开《诗经》。

为什么我又拾起《诗经》来呢？这是时代使然吧。我想，像我这样的人，已经被“放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不能重回工作岗位，

只能与大草原的荒草同朽；而中华文化终归要代代传承下去，传承民族文化，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一点事情了。当然，我也想过把我读马列主义产生的疑问和思考写出来。这太危险！万一被检查出来，会连累妻子和儿女。他们受牵连已经够惨的了，不能让他们再惨遭磨难。写点现代文学评论吧，将来有几位作家能进文学史呢？现在我没有发表文章的权利，所写文字很难存起来，若干年后存稿如果得见天日，时过境迁，那些评论已毫无意义。文学评论必须评论有重大价值的作品，才能一同传世。《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必然代代相传，一万年之后还要被阅读、研究。既然我过去有过看法，有过想法，有过计划，那就完成当年的夙愿吧！后来我的老朋友、诗人王亚平有一首七律诗赠我，发表在1982年《野草》第二辑，题目是《赠诗经专家夏传才》：

渭北初识正华年，首都近聚鬓霜添。

文山诗海探索远，雪地风天行路难。

不使才力付流水，独抱经骚苦钻研。

忽见窗外曙色现，飒然跃马向中原。

“不使才力付流水”，正是我当年的心态。真正研读《诗经》，才知道《诗》学博大精深，一个人所能做的太少了。没有对先秦史、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民俗风习的真正了解，没有扎扎实实的语言名物的训诂功夫，过去想译《诗》，实在是不自量力。于是我从头学起，一篇篇读，一本本看，学古代史、先秦哲学，梳理诗经学的发展过程，陆续写点札记。这些札记便是后来的两本书

中二十多篇文章的雏形。所以，就治《诗》来说，我是个小学生。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得到平反，回到大学工作。我有时间、有资料，而且可以公开治学了。针对胡适所说两千年《诗经》研究是个烂账簿，初学者无从入手，我则认为有迹可考，有规律可循；进行名著学术史的研究有益于学术的进步，便着手《诗经研究史概要》的写作，并在 1982 年出版。

北京的老朋友对我研治《诗经》表示遗憾，劝我回过头来继续文学创作。人文科学研究者只能在自己时代的科学水平上，吸收前人代代积累的成果，把认识向前推进一步，而认识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后人又会继续研究，再把认识向前发展，这个认识的运动永远不会终止，永远不断超越。文学创作是艺术创造，作品是有相对稳固性的艺术品，由人们从不同方面去鉴赏和研究，因而成功的艺术品具有永恒的魅力。我的朋友说：“你何不全力创作一部作品，让一万年之后的人来研究你？”他们还出了个题目——《三个监狱》，建议我把国民党、日本法西斯、共产党的三个监狱用情节串起来，进行艺术构思；监狱是社会的缩影，可以反映不同社会和集团的本质。他们的说辞未尝不曾使我动心。但我最后回答：从古至今，搞创作的人难以计数，有几部杰作流传？“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作者，几千上万，千年之后能有几本传世？写新诗，需要沸腾的生活、澎湃的激情，我历经坎坷，磨炼得冷静和忍耐，已经不易激动，唤不起灵感；写小说，两鬓斑斑，难以胜任宏大的构思，也失去驰骋无羁的想象力，何谈进行形象思维？与其呕心沥血写出将来的废纸，倒不如自认才疏，老老实实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加进一点一滴。所以，我的论文，不过是诗经学

长河中的涓滴之见而已，我从不认为它们有多大价值。

《诗经研究史概要》出版以后，因为它是第一本讨论诗经学史的书，得到一些好评，被不少高校定位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海外翻印了繁体字竖排本，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些评论文章。日本《中国文学报》的评论在溢美之词以外，为书中“笼罩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表示遗憾。我觉得，能够被世界上的同行认为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学术史，是我深以自慰的事，问题是我还运用得不好，还有形而上学的东西，尤其是对现代的某些学者未能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台湾学者批评我对鲁迅、郭沫若在《诗经》研究上的作用夸大了，最近还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发表“商榷”文章，说我对胡适的评价不公正。他们的意见都很好，基本上是对的。我的那本书的确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刚刚拨乱反正，乍暖还寒，用笔行文不得不有所顾忌，对现代人物的臧否，很难把握；古代的评述部分，也有粗疏之处，如对明代诗经学成绩的评述就很不充分，原因是有些资料我没有读到，难免因袭成说。这本书已经进入学术研究的档案库，为对历史负责，我只能保持旧貌，不宜修订了。

我研治《诗经》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前面说过的，《诗经》的艺术魅力长久不衰，我想总结它的艺术经验作为发展当代诗歌的参考。1985年出版的《诗经语言艺术》是初步的尝试。这本书初版在大陆发行了三万本，1990年台湾翻印的繁体字竖排本也印行了三次。因为最初是照我上课的讲稿排印的，有疏误和不足，又加以修订，于1998年出版修订本，名为《诗经语言艺术新编》。

我研治古代文献的根本目的，是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我

们有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它是我们伟大民族延续、自强、凝聚的力量源泉。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异族征服中国的土地，但最后中华文化征服了他们。如今华人遍布世界，中华文化发生着向心力的凝聚作用。我毕生追求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由于个人际遇，历经坎坷的我，如今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有为传承民族文化而竭尽绵薄了。

《诗经》只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之一，影响大的还有儒家的其他经书。我曾为研究生讲“十三经概论”，觉得现在通行的还是20世纪40年代蒋伯潜的讲本，经过半个世纪，已有新的资料、新的研究成果，早就应该“换代”了。我边讲课边研究，撰写了《十三经概论》，于1996年和1997年在台湾和大陆两地出版，并被韩国高丽大学选作中文系教材。作为这本书的副产品，还有一本《论语趣读》，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除了上述两本《诗经》专著，二十年来，我还写了几十篇诗经学的论文和境外讲演，它们编集为《思无邪斋诗经论稿》，于2000年出版。

在我们的时代，只啃一本经，是没有粥喝的。教书，不能只讲《诗经》；我的工作，也不只是教书。二十多年来，我还发表过几十篇诗经学之外的文章，编集为《思无邪斋文钞》，于2002年出版。

古籍整理方面，出版过《曹操集注》（1984）、《曹丕集校注》（1992）；还有我在1985—1987年开古文论课时的作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今译》上下二册（此书修订本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改书名为《古文论译释》上、下）。此外，主编过几

部大学教材和几套丛书。

回顾我治学的道路和成果，也许数量不算少，但质量颇多粗疏；而且学术水平不高，主要原因是读书不多。我曾叹息：我永远赶不上我的老师，他们拥有万卷书；读万卷书，厚积而薄发，文章厚实有分量。这不是我不好学，也不是我不勤奋，在战争环境、监禁和流放岁月，我不可能广博地读书。现在，我有条件购置万卷书了，耄耋之年，哪里来得及读完？我一再告诫我的学生：治学的根本条件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我不懒惰，从来不午睡，习惯夜间工作。我已经丧失了二十三年时间，必须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白发斑斑的我，再不出成果，不多做工作，就来不及了。我有强烈的紧迫感。1998年我在台北脑出血，抢救及时，一个星期后回大陆，头颅上绷带未除，我又开始写书了。说来也有趣，只要我坐到书房写字台前，握起笔来，就感觉自己还年轻，就产生信心和力量，好像什么病都没有了。能够像马克思老先生那样，面向写字台，坐在靠椅上，没有痛苦，没有依恋，安静地走向另一个世界，那是多大的幸福啊！前年，我写过一首《病中吟》：

长年皓首穷古经，夜半文章五更钟。

沥血非谋名与利，中华赤胆一书生。

大概早年我是学诗的，积习难改吧，五十年不写新诗了，但偶尔吟咏旧体诗词，出版有《七十前集》《思无邪斋诗抄全编》。

我时常感到内心有一种缺失感，这就是心灵中的英锐之气没

有消失，仍梦想跨上战马驰骋沙场，为博爱、平等、自由的新世界而奋斗。

1990年填过一首词《水龙吟·重临阜平》：

老来旧梦何多，太行立马黄昏月。苍山夕照，烽烟故垒，当年曾搏。并辔吟诗，风流战友，音书早绝。忆
壑沟射虎，养疴茅屋，农家女，丝银不？四十年华飞度，
指弹间，头颅堆雪。征途坎坷，文章命薄，铁窗蚀骨。
旧地重游，再挥利剑，旌旗迎目。问秋风，犹记滹沱血战，
浩歌新曲！